

顾维钧 回忆录

第三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何双生

顾维钧回忆录

GU WENJUN HUI YI LU

第三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 17 1/8 印张 5 插页 · 387 千字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198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统一书号：17012 · 1221 定价：4.65 元



顾维钧博士在国联大会上致词 1937年5月15日摄于日内瓦



顾维钧博士与孙科（左起第一人）合影（孙科在去莫斯科途中接
受荷兰广播总会电台的采访拍摄） 1938年1月14日报于阿姆斯特丹



顾维钧博士在国联大厦休息室与苏联外交
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谈话 1938年摄于日内瓦



顾维钧和老政台家李石曾合影 1938年摄于日内瓦

目 录

第三分册

第四卷 出使法国(1932. 10—1941. 7. 2)·中

第六章 欧战爆发前的外交活动

1937年11月末——1939年8月中…………… 3

第一节 布鲁塞尔会议的余波

1937年11月末——1938年5月中…………… 3

(1) 谋求停战和列强间的协同行动

1937年11月末——1938年1月…………… 3

(2) 中国继续在海外谋求列强和国联的支援

(甲) 1938年1月末——3月末…………… 46

(乙) 1938年3月末——5月中…………… 78

第二节 国内军事形势恶化, 欧战迫在眉睫, 中国需要援助日益迫切, 获得外援更加不易

1938年5月末——8月…………… 117

第三节 中国再次向国联申诉, 因欧洲危机而告失败

1938年9月…………… 174

第四节 在日本开始南进, 而西方列强又缺乏单独行动积极性的情况下, 我所进行的外交努力

	1938年10月——11月中	219
第五节	在当时欧洲的形势下，西方国家 在远东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938年11月中——1939年2月初	276
第六节	在日本企图加强对中国的政治控 制并在太平洋地区实行军事扩张 之际，西方各民主国家在远东采 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国际形势 1938年12月末——1939年2月初	316
第七节	轴心国在欧洲和远东的猖狂活动 对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所起的 作用 1938年2月末——4月初	377
第八节	促进中、英、法之间的合作 1938年4月初——6月初	423
第九节	日本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猛烈冲 击所引起的反应 1939年7月——8月中	476
附录一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声明	535
附录二	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的广播讲话	537
附录三	法国向中国提供货币稳定贷款问题	541

第 四 卷

出 使 法 国

(1932. 10 — 1941. 7. 2)

中

第六章 欧战爆发前的外交活动

1937年11月末—1939年8月中

第一节 布鲁塞尔会议的余波

1937年11月末—1938年5月中

(1) 谋求停战和列强间的协同行动

1937年11月末—1938年1月

我打算就布鲁塞尔会议以后的一些情况再说几句。在会议结束前夕，中国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中国政府一方面迫切希望和日本达成停战，另一方面它又迫切希望从列强（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那里得到他们将采取某些实际行动的确切保证。中国政府最盼望列强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两种：一种是以贷款和军火支援中国的具体计划，以及一些海上和陆上的示威行动；另一种是拒绝向日本提供任何贷款或军火的明确方案。但是我和各列强代表团首脑们举行的一系列会谈清楚地表明，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愿意单独采取行动。每个国家都声称它同情中国的抗战事业，并且愿意作出贡献，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任何措施都必须由强国以协同行动的方式进行。这里所谓的强国主要指的是英国和美国。

例如关于印度支那过境运输问题，法国政府一直在作出最大的努力给予合作，并且表示只要它能从华盛顿和伦敦取得某种协同行动的保证，它就决心保持印度支那这条路线畅通无阻。但是英、美拒绝做出这种保证。伦敦方面表示，只要华盛顿同意，英国是愿意作出保证的；而在美国，尽管罗斯福总统也对中

国寄予很大同情，可是由于受到中立法案明文规定的限制，美国政府还是认为不能随便行动。要求苏联进行一次陆上军事示威行动也存在同样的困难。莫斯科并不反对这一要求，它并且暗示如果由于示威而引起日本方面的报复行动时，能够获得可靠的支援，它就愿意行动。而这种保证英国和美国却又都不愿意提供。

总而言之，中国为了抗战事业而向列强寻求有效的支援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至此却变成了与中国和远东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三大强国之间互相踢皮球的一场游戏，这三个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必须坚决要求四强作出计划的支援和合作，特别是因为布鲁塞尔会议已经以失败而告终。

在会议接近结束时，中国需要援助的情况变得越来越迫切了。由于日军在淞沪战场上大量增兵并向南京方面迅速推进，使得中国的军事危机愈益严重。这种危急的军事态势促使中国政府渴望和日本停战，并要求与会的主要强国施加影响，促成停战，以便中国军事当局可以争取时间重整防线。在此同时，中国政府仍然希望从列强那里得到源源不断提供武器和弹药的确切保证，以便继续抵抗。

关于安排停战的问题，我曾和美、英、法、苏在布鲁塞尔的主要代表们进行过多次会谈。但是诺曼·戴维斯先生在1937年11月26日和我会谈时表示，他希望我们就他所谓的“在和日本停止敌对行动的某种安排中，中国可以接受的条件”提出一份声明，供他本人使用。他解释说，虽然会议已经闭幕，但他将继续密切注视远东的局势。他认为如果美国试图出面调停而仅仅充任一个在中、日两方之间往返传递意见的中介人的话，那将是徒劳无益的。他相信唯一有效的途径是由一个第三者，意思是指

美国，提出一个它认为在相当程度上能够适应于双方观点的意见。他说要调停必须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而第三者仅仅充当一个中介人，那末日本方面肯定会提出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要求。同样，中国方面也会提出日本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他说例如美国，就肯定不愿为日本传达明知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意见。

我问他美国是否愿意单独出面担任调解人。戴维斯先生说美国很乐于充任这一角色，只要日本方面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所设想的调解，但是直到那时并无此种迹象。不过他相信其他强国中也有愿意出面参加调停的。

我提到传说中的德国愿意出面调解一事。我告诉戴维斯，柏林表示愿意出任调解人。我的同僚郭春祺说，他知道日本曾要求德国向中国转达其和解意愿。戴维斯说，据他了解，事情刚好相反。他说是德国自告奋勇出来调停，其目的是为德国自己在欧洲捞取政治资本。很明显，德国不可能提出有利于中国的条件，因为日本只希望它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调停。因此戴维斯希望中国代表团向他提交一份声明，阐述中国在不损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則下可以接受的各项条件。我答复他说，我十分愿意照办。

我告诉他，前一天接到蒋介石将军的电报，要求中国代表团秘密地提出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的问题。我说如果列强能够暗中发挥影响不给日本商业信贷，这在当时情况下对中国将是大有裨益的。戴维斯先生说，美国官方早已停止向日本提供信贷了。至于商业贷款，美国私营银行只有在指定抵押的黄金运出日本本土以后，才肯向日本提供贷款，这就意味着仅有十天上下的通融期。

亨培克博士于离开布鲁塞尔回美国前，看望了我。他再次要求我提出一个备忘录，用以说明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可

以达成协议的一些问题。他所要求的仅仅是由中国代表们私下提出的非正式声明，即在他们看来，为实现中、日和解，中国方面可能接受的条件。他说他之所以期望戴维斯得到这样一份备忘录，是因为考虑到一旦美国政府有可能出面调解时，从调解者的角度看最好能提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他想这种做法比起向双方正式征求意见更好一些。他说另外还有一些政治性的问题，例如满洲的问题，在当时就不可能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他说中、日问题本来是件难办的事，内容又极为广泛，要想一下子得到全面彻底解决，未免要求过高。但是据他看来，有一些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丝毫无损于中国的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可以同意。他想或许可能达成某种临时性协议，这种协议至少可以作为立即停火的基础而又顾全了日本的面子。亨培克的意见是希望中国代表团准备并提出这样一份秘密的和非正式的声明。他解释说，他甚至不要求中国代表团把他刚才说的话电告本国政府，这样他从中国代表团所取得的声明对中国政府就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仅仅是供他个人参考的资料而已。

亨培克博士提到我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曾概括地提到原料问题和中、日经济合作问题。我回答他说，除了这些以外，中国在最近几年中还表示过愿意就其他一些问题和日本达成协议，例如由中国向日本纺织业供应棉花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告诉他，我了解到日本虽然买进了大量的美国长纤维棉花，但仍需要中国短纤维棉花来进行混纺。另外，某些日本工业家为了解决日本的需要，还打算象英美烟草公司推动中国的烟叶生产那样，采取措施来提高中国的棉花产量。还有沧州——石家庄间铁路的铺设权问题，虽然中国和法国已经早有前约，但日本一直希望能获得这一权利。还有龙烟煤矿和铁矿以及由长芦盐田

供应食盐的问题等等，都是日本方面在过去一段谈判中提出过的。

关于供应食盐问题，我指出日本人要食盐不单是为了制碱，他们的军需工业也需要食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山东问题谈判中就已作了不少的努力。事实上中国已就青岛盐田问题和日本达成了一项协议。至于建立一条航空线的问题，我告诉他这个拟议本身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日本必须停止它在中国的违法飞行行为，特别是它的军用飞机仍在无视中国的抗议而闯入华北地区。此外还有要求中国降低关税税率和达成互惠关税税率的协议等问题，我说只要日本停止它在华北的走私活动，这些都可以协商。

我告诉亨培克，所有这些问题全都可以而且应该协商，但是协商要服从一个总的条件，那就是这些协商的性质不是中、日两国间排他性的交易，而是在合作的原则下，普遍适用于其他大国的。换句话说，就是这种协商不应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精神。亨培克评论说，这正是他认为布鲁塞尔会议的最后宣言之所以重要的理由，因为其中包含着某些原则，强调了其他大国对中、日间可能达成的任何协定应予合作的必要性。他认为保护外国在华权益对中国也起着保护作用。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和当时法国国务会议副主席（其地位相当于副总理）莱昂·勃鲁姆的一次谈话。那时陈公博刚从罗马来到巴黎访问。他在罗马曾见到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人们不难记起这两人和陈公博会谈时都力劝中国接受由意大利进行调停的建议）。我带陈去见勃鲁姆，谈论欧洲的形势以及法国对中、日战争的政策。在我们交换了意见并听取了勃鲁姆对欧洲形势所作的分析后，我提到了布鲁塞尔会议的失败。

勃鲁姆解释说，这实际上是由于美国国内形势使得美国代

代表团采取消极态度而造成的。他说很明显，美国国会内外的意见都不赞成罗斯福总统在布鲁塞尔会议上采取强硬的行动路线。虽然最初美国似乎有意执行强硬的政策，但是在行动上并没有贯彻始终。他认为，1931年约翰·西蒙爵士在满洲事件问题上拒绝与美国合作，使美国政府受到了奚落，这一教训，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引起了愤慨。他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埃塞俄比亚问题时，美国就以牙还牙，拒绝了英国提议的石油禁运政策。那时本来也应该争取荷兰的合作。但荷兰是个小国，它怕万一事态复杂化时没有大国为它撑腰，所以不想参加禁运。

陈公博说在罗马时墨索里尼曾告诉他，独裁主义国家一贯主张积极行动，而民主国家则总是执行消极政策。我说，民主国家之所以行动迟缓，是由于它必须取得公众舆论的支持；而独裁国家则可以迅速行动，因为它可以无视公众舆论。勃鲁姆表示同意我的见解，并且补充说，民主国家即使行动起来，也是各行其是而不能协调一致，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例如在1931年美国打算采取行动时，英国没能跟上，这次英、法两国准备采取一些措施来支援中国，而美国却又未能行动。

勃鲁姆认为唯一能使中、日战争得到解决的办法，只有英国、美国和苏联携手合作，形成联合战线。这确实也是我的想法。因此我说，如果这三个国家联合起来警告日本，就能使日本感到压力而不敢继续进行战争玩火。勃鲁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能迫使日本接受停战而不冒任何风险。

这时陈公博吁请法国发挥影响，促使其他三个大国采取这种协调行动，并且提到，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和各大国分头交涉，但发现很难促使他们行动一致。勃鲁姆说，困难在于美、苏两国间的关系虽然不坏，但还不是亲密无间。英、苏两国关系亦

复如此。在远东，英、苏两国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如果他们能够诚恳合作，美国纵然不愿起带头作用，也肯定会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来。

我表示希望法国能够利用它和英、苏两国都有亲密友谊的有利地位积极把两国撮合到一起。勃鲁姆说，在英、苏两国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正是他所一直在努力争取的事情。

12月2日，我走访了住在巴黎布里斯托尔饭店的诺曼·戴维斯先生。他的代表团刚从布鲁塞尔到达巴黎。我当时交给他两份他所要求的备忘录 一份是当时中国的急需，另一份是概述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基础。

戴维斯对我说，他一直在认真思考中、日之间可能达成媾和的条件。他认为“满洲国”问题是主要障碍。他问我中国是否愿意明智地考虑接受现状，以十年为期，观察事态的发展。他相信日本肯定会要求承认“满洲国”，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我说我认为解决满洲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基础早已在李顿报告书中提出过了。但是戴维斯认为，日本人决不可能接受那样的基础。

于是我说如果中国的主权和地位不会受到任何损害的话，那末等待十年的建议未始不可以考虑，这和比萨拉比亚问题的解决方式同出一辙。当年苏联在和罗马尼亚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甚至在伦敦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它都保留了对比萨拉比亚省的要求。戴维斯说，他刚才的建议基本上就是这种意见。

我对他说，另外还有两个主要问题，即上海问题和华北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把1932年中、日两国在英、美、法、意四国的赞助和参与下达成的协定恢复起来，可能获得一个暂时性的解决。戴维斯说，曾经有人向他建议，上海问题要在全面中立化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样中国可以为它自己保留一个商业和金融的大都市。我说，那将违背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